

演化的政治经济学——霍华德·J.谢尔曼在获得凡勃伦—康芒斯奖时的讲话
[信息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上传时间: 2006-01-05]

关闭窗口

演化的政治经济学 ——霍华德·J.谢尔曼在获得凡勃伦—康芒斯奖时的讲话

[美] 霍华德·J. 谢尔曼

朱培 摘译

发表于《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2期

美国《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6月号(第38卷第2期)刊登了霍华德·J. 谢尔曼的文章《演化的政治经济学——在获得凡勃伦—康芒斯经济学奖时的讲话》。凡勃伦—康芒斯奖是美国演化经济学学会设立的经济学家奖,其获奖者均为有独立创见的经济学家,如1976年为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99年为保罗·斯威齐。谢尔曼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在研究商业周期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有《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危机》、《重新发明马克思主义》,等等。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凡勃伦的演化经济学的观点,阐述了商业(经济制度)对工业(技术)、既得利益者对普通民众、野蛮制度对民主制度这三组对立,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像新古典学派鼓吹的那样是永恒的和不可替代的,它的命运将像此前的原始社会、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走向灭亡。文章重点剖析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认为对美国普通民众而言,政治民主是有限的,经济民主更是谈不上。文章摘译如下。

凡勃伦告诉我们,经济学是演化的科学。所有的制度主义者都同意凡勃伦的原则,即社会分析应当从体现人类关系的制度开始,而不是从任意的心理学法则开始。从特定的制度着手则意味着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制度,而这就意味着变革和演化。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基本制度中会发生演化性的变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对长期均衡的分析。制度主义者都认可存在演化,但是很少详细阐述这个概念,也几乎没有将它用于分析专门的案例。具体的演化范式的关键问题在于凡勃伦提出的两个二分法。这两个二分法当然不是超历史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而是灵活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方式。

一、两个二分法

在凡勃伦的许多著作中,都论述了“商业”(经济制度)同“工业”(技术)之间的二分。商业和工业指资本主义的特殊状况,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制度和技术之间的二分法在许多社会都很重要。某些时候,制度促进技术,但在另外一些时候或地方,制度阻碍技术。这里,“技术”一词是在最广泛的涵义上使用的,不仅包括知识和组织,而且包括劳动力的水平和质量、资金和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

社会经济制度已经变成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制度必然会发生演化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大量有利的环境和人类群体的活动。凡勃伦在他的第二个重要的二分法中明确了这一点。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与普通民众的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和冲突。既得利益者往往竭尽全力来阻止任何改变使他们得到财富和权力的制度的企图。普通民众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战胜这种抵制，而普通民众只有在一个直接的危机危害到他们时才会付出这种努力。以下分析中会提示其中的一些危机。即便是在危机中，在民众奋起斗争时，普通民众也没有必然战胜既得利益者的保证。所以，在演化性变动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的。重大的演化性变动，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只有当制度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意识到这一点并愿意战斗，而且民众的力量能够战胜既得利益者时才会发生。

二、按照二分法解释的社会演化梗概

至少有10万年，人类以小型的狩猎、采集群体为生存单位。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人们集体参加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工作。不仅大多数食物都是集体生产的，而且消费也是集体的，每人得到一份。在这种公社制度中，固定财富很少；人们的收入大致相等，所以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男人和女人在权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在最早的狩猎-采集者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没有那么多财富可以掠夺。也没有为获取奴隶而进行的战争，因为一个奴隶能生产的不会超过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战俘作为奴隶是没用的，所以他们被杀掉，或者在某些罕见的社会中被吃掉。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声称资本主义别无替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这个早期文化时期哲学家同食人族国王的对话。哲学家问，吃其他族的人是否道德败坏。国王回答说：“吃其他族的人是人类的天性，所以科学分析表明，食人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别无替代。”

建立在大家族狩猎和采集基础之上的公社制度似乎是永恒的。但是，在公元前12 000至公元前10 000年前后，在中东和中国的肥沃河谷，新石器革命开始了。它经历了几千年的转变，但最终给人类带来了更好的工具、陶器、农业和畜牧业。它导致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建设大城市的能力，以及艺术家用来装饰城市和建立美丽的纪念碑的闲暇时光。它也终结了平等和公社社会。

用凡勃伦的话说，旧的经济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发展。面对贫富不均和奴隶变得有利可图的事实，公社形式变得过时了。仍然保留公社形式的群体不能快速提高生产力。

酋长们在越来越大的部落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一转变用了很长时间。用凡勃伦的话说，这意味着努力扩大酋长及其密友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同希望维持平等结构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

外部冲突包括最有实力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战俘的出现，他们变成了奴隶。这样就产生了等级制的社会，由统治精英和绝大多数不自由的农奴和奴隶组成。不自由的劳动者生产的产品由精英分子享用。所以绝大多数人缺乏自由，生活困苦。

把这称作“进步”仅仅意味着看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精英分子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忽略了绝大多数人的恶劣的生存条件。诸如“社会进步”这样的主观概念仅仅在旁观者眼中存在，对我们了解复杂的结果于事无补。的确可以用量化的方法衡量生产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首先，生产和技术在有些时期倒退，比如在罗马帝国垮台之后。所以甚至生产的进步也不是必然的，而是依赖有利的制度。其次，广义的“社会进步”，即整个社会的进步，并不是可以客观地加以界定的。如上所述，从早期的公社社会向等级制社会的转变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但它也带来了奴隶制。谁也不能从客观的标准出发把这称作是社会进步。最后，从更宽泛的领域观察，现代雕塑是否同古希腊雕塑一样美？这依赖于观察者的看法。

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演化

多数人受压迫和被强制生产剩余产品的社会形式在世界多数地区流行了一万年以上。在当时的所有社会中，奴隶制和农奴制是主要的劳动力形式。虽然这些经济制度在最初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它们最终开始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经济发展则使得社会冲突激化。

例如，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占主导地位，尽管还存在农奴制和其他不自由的劳动。奴隶制最终成为生产进步的障碍，因为奴隶们破坏机械而且经常使用机械反叛，简单地利用土地导致地力被消耗殆尽，而且奴隶主不愿降尊去从事发明，因为他们认为这属于工作的一种形式，而当时的意识形态宣称工作只应由奴隶去做。经济停滞削弱了帝国。奴隶起义、将领对权力的争夺以及蛮族入侵最终摧毁了帝国。

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崛起

罗马帝国的衰亡导致好几百年的混乱和技术的倒退，接踵而来的是农奴制占统治地位，虽然还有奴隶制的残留。在农奴制下，无论地主还是农奴，种庄稼的目的都是自给自足。这意味着没有商业性的庄稼，技术创新也不会带来利润。因此，农奴制度阻碍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经过复杂的历程最终导致封建劳役的结束，但结果还是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由以前的农奴租佃。取得租佃权意味着需要货币，这就意味着出现了商业性的粮食生产并开始关注新技术。为市场而生产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在英国的农村出现，然后它传播到英国的城市，欧洲的其他地方，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

美国南方的奴隶制

虽然资本主义在500年前的英国已经兴起，但是奴隶制、农奴制以及公社性质的狩猎-采集者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美国南方，奴隶制直到内战还存在着。像所有这种社会一样，南方使用暴力、皮鞭和屠杀来对付反抗者。奴隶们在他们艰苦而短暂的生命里为奴隶主的奢华生活而劳作。凡勃伦在这里使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二分法：工业（商品生产）对剥削（即把别人生产出来的东西夺走）。

从社会角度看，奴隶和妇女都被看作是白种男人的财产。只要他们愿意，奴隶主可以占有任何女奴隶。但是一旦统治阶级的妇女和一个奴隶有这种关系，那么这个奴隶就会被处死。

奴隶主确信他们的制度是自然的，会永远持续下去，被上帝保佑而且确实没有可行的替代品。奴隶制度阻碍技术进步的原因有许多。第一，奴隶蓄意破坏新的工具或把它们砸烂充当武器。第二，土地使用必须保持简单，因为只有最简单的农业生产程序才可以被监督。第三，在古罗马，在内战前的南方也差不多如此：奴隶主的意识形态是，所有工作都应由奴隶做，因此他们不愿意学技术或搞发明创造。

除了轧棉机，奴隶制的南方很少有技术发展。农业始终是粗放经营，工业在奴隶制度下进展相当缓慢。还有一个原因使得在工业中几乎不可能使用奴隶，那就是哪怕只是教奴隶读写也会招致严厉的惩罚。

因为奴隶制阻碍经济进步，社会冲突使奴隶制走到尽头。南方发生过100次以上的较大的奴隶起义，而且逃亡奴隶成为联邦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资本家和北方工人同南方奴隶生产出来的产品竞争，而且争夺对西部的控制。自由农民也同企图在西部扩张的奴隶主进行斗争。结果导致一场19世纪全世界最血腥的内战，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

美国资本主义的真相

内战后，资本主义明显在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大推动了技术进步。但也有反复。19世纪当中美国经济有好几次倒退，而不是进步。20世纪也有几次倒退，包括持续十多年最后在战时生产中得以恢复的大萧条。21世纪的最初四年经历了由经济增长到经济滑坡的过程，证券交易泡沫成为上百万小投资者的灾难，失业率上升，一些工程师，尤其是计算机行业的工程师也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全球工业衰退以及超过400万人失业，即使是爱丽丝也不可能想像出如此的经济奇境了。

这一系列严重的倒退戏剧性地证明了凡勃伦关于商业和工业之间的二分法。在每一次经济扩张期间，市场需求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限的工资意味着有限的购买力。况且，收入的上涨会增加进口，导

致出口减少。最后，增加税收会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并且还可能出现财政盈余，这样会抽走经济领域中的资金并降低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每一次经济扩张期间，生产成本都在增加，包括更高的原料价格，更高的利率，更高的税收。所以，这个制度倾向产生一个接一个的倒退。

我在关于商业循环的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过程的细节，并且发现经济增长和衰退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现象。固然，外部的打击起一定作用，但它们本身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果。

如上所述，在每一次扩张期间，市场需求的增长都是有限的，而成本也持续增长。结果利润达到最大值，通常是在这个周期达到最高点之前六到九个月。利润减少在稍后会导致公司投资的减少，这是导致衰退的直接原因。于是相反的程序开始，最终导致另外一轮的扩张。这个不稳定的体系在所有人群中导致连续的不确定性并导致——在失业和破产之外——所有心理问题和周期性的犯罪的增长。

从全球来看，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多数地区占主导地位仅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在第三世界国家时间更短。它至少有两大成就。它带来了工业革命，使得产量和生产能力成倍增长到一个可观的水平。而且，它把劳动者从超经济强制中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形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在富有的美国有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在新殖民地地区这一比率更高。本来有足够的资源能使所有人得到满意的医疗照顾，但即使在美国也有4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依然存在。还有环境灾难。而且，所有这些都笼罩在上述阻碍生产和创新的可怕的不稳定性的恐惧阴影中。

最后，还有战争。如上所述，战争在不同制度主导的社会中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史前人类没有持续的战争，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财富可掠夺，而且生产力水平太低，奴隶是无利可图的。在奴隶制度下，战争是为了夺取城市的财富、获得土地、获取奴隶而进行的。封建战争类似地也是以夺取庄园、土地和农奴为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大国都显示出通过直接建立殖民地或纯经济手段控制别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在近几年，除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最新占领，开拓殖民地已经结束了。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尽可能多地控制世界的战争中，有许多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争夺霸权而发动的。也有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功地从直接的政治统治之中解放出来，但极少有哪个国家能够从经济统治下解放出来。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最早的伟大的解放战争之一就是北美独立战争。非常遗憾的是，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发动了多次战争，比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如果凡勃伦只注意媒体的爱国主义辞藻，说不定他也会被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媒体这一大规模欺骗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ception）关于伊拉克存在神话武器的言论所迷惑。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不稳定和停滞或衰退问题不能自动结束这一制度，但的确会加剧既得利益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于是，大萧条期间爆发了美国内战以后最严重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一系列重大改革，称作新政。这样，凡勃伦所说的两个二分法，即工业与商业以及既得利益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就塑造了资本主义的演化。

在当代美国，“普通民众”包括职业人士比如工程师、程序员、教师，技术工人还有非技术工人。薪水较低的经理和小业主可能放在另一类，要视问题而定。另外是各种资本家：工业、商业以及金融资本家，他们在不同问题上通常有不同的利益。

应该强调的是，既得利益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日常斗争可能是严重的，但不会危害到体系。只有当第一个二分法，即制度妨碍经济发展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时，体系才会受到危害，比如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或美国奴隶制末期。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既得利益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斗争会通过选举和其他场合表现出来。近年来，通过一些丑闻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大公司并不坚守规则。它们为了自己的非法所得企图像操纵经济程序那样操纵政治程序。而且，政

治选举正变得越来越昂贵，使得通过与商界的密切关系筹集竞选资金的压力空前加大。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两大政党共耗费了30亿美元，还不包括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费用。

无论人们对经济体系怎么看，大多数人确信他们的选票对基本问题不会产生丝毫的作用。多数人忙于个人的生存问题，他们感到没有时间关心政治，尤其是因为政治是肮脏的而且是与自身毫无关联的事情。结果，2000年总统选举只有一半选民投票，2002年的国会选举投票率更低，多数情况下，参加地方选举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那些肯定要投票的是富人，但是低收入人群多半不参加投票。失业者不会去投票，那些享受福利待遇的人即使投票，人数也非常少。所以是富人们决定选举结果。如此一来，虽然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民主统治的形式，但实际上都是寡头政治。

媒体并不总是对既得利益者提供的错误信息表示异议。一个学术调查发现公众有如下错误概念：22%的人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发现；48%的人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基地组织的基地在伊拉克；25%的人认为世界舆论支持我们入侵伊拉克。错误概念的比率越高，支持战争的比率就越高。而且，这些错误概念跟他们使用的新闻来源有密切关系。例如，福克斯新闻（Fox News）被保守派控制，它的听众错误概念最多，其中80%的人相信这三条错误概念中的一条。然而，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只有23%的听众有至少一条错误概念。所以，媒体对既得利益者散布的错误概念很少加以更正，而那些被牢牢控制的媒体比其他媒体更糟。

如果说政治民主被资本主义制度限制的话，那么经济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不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济繁荣中，人们经常谈论经济是由数百万小投资者直接或者通过养老金控制的。在紧随其后的经济衰退中，惨痛的事实是，小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地丧失了他们的大部分积蓄。那些用养老金基金投资的人受制于股票市场，而不是相反。他们当然不可能控制大公司。

在大公司中，控制权掌握在董事、最高执行官和大投资者（通常是同样的一些人，只不过冠以不同的称号）组成的小集团手中。这个处在企业最高层的小集团可以随心所欲地雇用或解雇雇员，对员工加以提拔或降职，把企业迁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扩张时期投资或不投资，或是减少产量并大规模裁员。如是，美国有的是工业独裁，而不是工业民主。绝大多数受雇者与最基本的决策无关。只有当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斗争的时候，他们的愿望才会成为决策的影响因素。

三、对凡勃伦社会演化研究方法的总结

前两个二分法提供了凡勃伦演化的框架。首先，在某些社会的某种条件下一——但并不是必然的——经济制度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增长。其次，在某些社会的某种条件下一——但并不是必然的——经济制度和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普通民众（希望过更好的生活）和既得利益者（希望保护现有制度）之间的冲突决定社会的方向。应该提到的是双方通常都是复杂的联合体，例如，普通民众与这样一些人结为合作关系：他们看出在新的经济制度中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最后，在某些社会的某种条件下一——但并不是必然的——这些冲突可能导致那些希望变化的人们的胜利。冲突有时导致渐进的变化和改革，有时导致急速的变化和革命。

凡勃伦说不可能预测未来的细节，但他确信，鉴于资本主义制度目前的趋势，资本主义会经历它的全部进程，并像以前的社会一样灭亡。之后，新的社会取决于人类的意愿，所以，它既不是可以预先确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可能导致可怕的野蛮社会，或者是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究竟是什么取决于我们。

他的确暗示，如果出现一个更好的社会，他的偏好（选择）会是什么，虽然我们可能会或者不会选择这样的社会。他似乎强调要大大完善民主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或野蛮制度的对立面。在《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中，他主张以工程师

作为从普通雇员中民主选举出的代表取代既得利益者。如此看来，对于凡勃伦来说，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是民主。

凡勃伦既提倡政治民主也提倡经济民主。凡勃伦对经济民主的定义在他讨论“追求手艺的天性”时得到强调。无论是遗传的天性还是文化上的传统习惯（我的观点），在凡勃伦看来，人类在经济生活中想把工作做好的愿望同资本家的专横命令形成鲜明对照，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而扭曲了这种愿望。很明显，凡勃伦赞同把工作做好的愿望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赞同工业的进步而不是商业制度造成的障碍，赞同经济民主而不是雇主独裁。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为争取妇女、少数民族和其他人政治民主而进行的成功斗争。但也有为争取经济民主而进行的具有启发性的斗争。比如，的确有由雇员拥有和经营的企业；一些由公众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管理的公用事业企业（如洛杉矶水电局），一些通过各种形式民主控制的媒体（如美国的国家公共电台和英国的BBC），以及一些公立的教育、医疗机构，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总之，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一书中阐述的那种民主经济制度有多种形式。控制权可以掌握在理事会手中，其中包括工程师、其他专家，也可以包括雇员的代表或公开选举或任命的代表。

不同的工厂可能有不同的雇员代表和公共代表的比例。需要公共代表代表某些重要的公共利益，比如环境控制。大公司当中的公共代表也是确保执行充分的全国性的计划以结束繁荣和破产的循环的惟一途径。

一些人主张为跨国公司制定国家和国际规则。但是如果控制权直接或间接操纵在既得利益者手里，那么规则是可以逃避的，所以它不如雇员所有制或公共所有制有效。

凡勃伦的演化论观点和二分法是颠覆性的，并与新古典主义的永恒的心理学术、均衡趋势、资本主义别无替代等观念完全相反。第一个二分法——商业对工业——揭示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都有经济制度阻碍经济发展的时候。所以，资本主义并非永恒的、最优的一套制度，实际上它在一定的时候破坏生产，可能被其他体系取代。

第二个二分法——既得利益者对普通民众——揭示了在我们的社会（和许多此前的社会）存在于精英利益和普通民众利益之间的巨大鸿沟。有时，比如在新政时期，普通民众通过艰苦斗争赢得胜利，但更经常的是（比如在布什政府时期）既得利益者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凡勃伦的二分法是一个道德命令，它要求回答这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

第三个二分法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野蛮，还是本质上好一些的民主社会。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的愿望导致野蛮。普通民众要求更好生活的愿望导致无论从政治领域来看还是经济领域来看的较为民主的社会。■

[朱培：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上一篇文章：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总序(孟捷)

下一篇文章：21世纪的演化经济学：一个宣言(盐泽由典)

版权所有：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电话：010-62511177如有任何意见或问题，请发Email至cape@ruc.edu.cn